

纺织工人话今昔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纺织工人话今昔

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《家史》编写组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375印张 35千字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

书号 3099·674 定价 0.15 元

目 录

毛主席是俺纺织工人的大救星

——青岛国棉四厂老工人庄立山讲家史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纱线千尺恨万丈

——青岛国棉九厂张崇珍的家史……………（ 17 ）

纱厂艺徒话当年

——访青岛国棉九厂退休老工人……………（ 36 ）

纺织工人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（ 54 ）

毛主席是俺纺织工人的大救星

——青岛国棉四厂老工人庄立山讲家史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我家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样，遭受地主、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。黄连苦，没有我们穷人的生活苦；黄海深，没有我们穷人的冤仇深。我家那血泪斑斑的历史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离 乡

我老家原是山东苍山县，祖祖辈辈给地主郑昌言当佃户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地，只有三间夏不遮雨、冬不挡寒、用碎石垒起来的小破屋。全家六口人，有爷爷、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爷爷带着父亲和哥哥一年到头拚死拚活地给地主种地，我和姐姐跟着母亲给地主做饭。一家人累断筋骨、流尽血汗，养肥了地主一家，可我们全家还是过着早晚两顿稀菜汤，中午一顿糠的苦日子。家里穷得连床破被子也没有。

我四岁那年秋天，母亲生下小妹妹还不到三天，地主郑昌言就硬逼着她去做饭。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，起五更睡半夜，泡粮食、推磨……十几口人的饭，都是她一个人做，再加上其他杂活，一天到晚没有个闲时候。刚生过孩子的母亲，哪能经得起这般繁重的劳动啊！不几天，她就累倒瘫痪了。狠心的地主看我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母亲再也不能为他卖命了，就找了个借口，把我们全家赶了出来。爷爷一气之下，便去找郑昌言讲理。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一千个理，一万个理，哪有咱穷人的半个理啊！郑昌言狗眼一瞪：“我家不养吃闲饭的！”说着把爷爷赶出大门。爷爷又气又恨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不久，便含着深仇大恨死去了。

爷爷死后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母亲瘫痪在炕上，哪里有钱医治呀！父亲看看全家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又租了地主王四的七亩山岭薄地。一家人整年泡在地里，好不容易盼到秋收，可是，全家一年的血汗，不但没有填满地主的口袋，反倒欠下了王四四升租子。父亲拿着空空的破口袋，眼巴巴地望着全部装进地主口袋里的粮食。这时，王四“嘿嘿”地奸笑着走过来，拍着父亲的肩膀假仁假义地说：“四升租子嘛，不要紧，今年还不上明年还嘛！”父亲望着王四，透过那

副狡猾的面孔，看清了他那蛇蝎心肠，他是要给个死扣套在我们穷人的脖子上，把我们一步步拉向死路啊。父亲越想越气，冲口说道：“地，我不种了！”

“不种了？”王四冷笑了两声，“没那么便宜，欠我的租子，就得给我种地！”

那年月，欠下地主的租子，就等于背上了还不清的阎王债。父亲看看屋里实在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，两岁的小妹妹饿得在炕上直打滚。大人能吃糠咽菜，可小孩怎么活呀！父亲坐在炕沿上，发呆地看着炕上张着小手要东西吃的小妹妹，眼里闪动着泪花，狠着心想把小妹妹卖掉，一来给她找条活路，二来用这钱还上地主的欠租。当父亲跟全家一说，母亲便把小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一家人围着小妹妹放声痛哭。我抱着父亲的腿在地上哭喊着：“爸爸呀，爸爸，你不能卖小妹妹呀……”父亲的眼泪簌簌地落在我的头上。母亲哭着说：“咱就是爬着出去要饭，也要拉扯着孩子一块过。活，活在一起；死，死在一块。”颤抖着的父亲，看着痛哭的母亲也泣不成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不是我心狠，实在是被地主逼得没法啊！”我扯拉着父亲的衣角说：“爸爸，我去给地主放牛顶债，不要把小妹妹卖掉。”

就这样，我刚满九岁，为了凑钱还债，就到离家

十七里路的太和庄，给地主王春祥放牛。刻薄的王春祥看我人小，一年只给四块钱的工钱，还硬逼着我父亲在字据上划押。字据上写着“一年不准回家，不足一年不给工钱，误伤、疾亡，雇主概不负责”等。父亲拿着字据沉思了半天，明知是火坑，也得跳啊！他忍着搅心的痛苦，颤抖着松树皮一样的手，含着眼泪，按了手印。这哪里是什么字据，明明是我的卖身契！从此，我便成了地主王春祥的小奴隶，整天挨打受骂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

有一次，我在坡上放牛，地主的狗腿子硬说牛啃了他的庄稼，拣起一把带刺的树条子，朝我没头没脸地抽过来，打得我浑身道道血痕，青一块、紫一块。我忍着疼好歹把牛赶到一块，等到太阳落了山，才敢回家。

晚上，老天下起了暴雨。我躺在牛棚里，摸着身上的伤痕，偷偷地哭着。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想家。牛棚外雷电交加、大雨倾盆。我强忍着疼痛，摸出了地主的家门，顺着崎岖的山路，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半夜才回到家。一进门，看到全家人，我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打哪说起，便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母亲含泪擦着我的伤痕。惊雷震天，盖不住穷人的愤怒；大雨倾盆，冲不净穷人的血

泪！

当夜，哥哥把我背回太和庄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王春祥踢醒了。他板着脸，阴沉沉地站在我身边：

“晚上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回家拿鞋啦。”

“怎么不告诉老子就偷跑？”他贼眼一动不动，死死地盯住我。

“告诉你怕……”没等我说完，一个巴掌打过来，我只觉得耳朵“嗡嗡”响，鼻子窜出了血，火辣辣的脸顿时肿了起来。打完后，他连饭也不让我吃，又逼着上山放牛。打那以后，地主更是天天找岔子，不是打就是骂。

一家人累死累活地干，到了秋天，总算还上了四升租子。终日辛苦终日愁，一年血汗两手空。熬啊，盼啊，熬过了冬天，盼来了春天，能吃的树叶都采光了，能吃的野菜也都挖尽了。父亲和母亲看看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心想，不能在这里等死，出去讨饭，兴许能寻条活路。父亲就找来一担破筐，一头坐着妹妹，一头装着全家的破烂家当。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，一家人一步艰难一步恨，含着眼泪离开了家乡。

地 狱

我一家在高密整整流浪了三年。一九三七年，全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了青岛。在穷哥们的帮助下，全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栖身的地方。父亲和哥哥给包工头拉木板车，他们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跑断腿，累断腰，也挣不上全家的吃喝。母亲和妹妹只好到附近的村庄去讨饭，我和姐姐就到街上垃圾堆里拣煤渣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青岛。日本资本家在青岛盖起了一座座厂房，铺修了一条条马路。这座座厂房，哪一座不是穷人的白骨垒成？！这条条马路，哪一条不是穷人的鲜血铺成？！七七事变后，卖国贼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，拱手把大片土地让给日本帝国主义，青岛就陷入了更深的苦海之中。

日本纱厂的资本家，为了从中国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，他们巧立名目，不择手段。徒工进厂得送“进厂礼”。邻居看我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，就七拼八凑了三块钱，托人把我姐姐送进了隆兴纱厂（现青岛国棉三厂）细纱车间当了学徒工。我也想进厂，可是哪里再去弄这三块钱？为了减轻母亲的生活担

子，我就自己跑到工厂去验工。说去验工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十几岁的小孩子，加上长期缺吃少穿，个子长得又瘦又小，去了几次，跑了好几个工厂，都没验上。一天，在工厂门口我看见好多童工，胸前用彩色粉笔画着粗粗的圆圈，心想，准是个验工的记号。我便拣了几块粉笔头，装进衣兜里，趁把头不注意，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大圆圈，硬是冒着危险，跑进了徒工的队伍。就这样，我进了大康纱厂（现青岛国棉一厂），在织布车间当了学徒工。当时我心里高兴极了，恨不得一步跑到家中跟父母报个“喜”。

那知进了日本纱厂，就象进了地狱，死不了也得脱层皮。工人每天要做十四、五个小时的活，早晨五点钟进厂，去晚了就挨打，下班后还得搜身。

资本家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，为了榨取高额利润，拚命提高劳动强度。车间里没有任何安全设备，工人们一天到晚在飞速转动的机器旁边操作，有的被机器截去了胳膊，有的被轧得粉身碎骨。中午没有吃饭时间，工人们只好边接线头，边扒一口冷饭。车间里劳动条件极差，到处飞花乱舞，纷纷扬扬，整天象下雪似的。工人们嘴里、鼻孔里都是花毛，脸上被花毛粘得象蛆爬一样难受，一天工做下来，身上的花毛可以成片往下揭。车间一年四季闷热难当，尤其到了

夏季，资本家为了使车间保持一定的湿度，把门窗关得严严的，车间温度经常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，整个车间象一个大蒸笼，一进车间，就闷得喘不过气来。工人们光着脊梁赤着脚，浑身起满了热疙瘩，汗水一渍，象针扎一样疼痛难忍。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在身上抹一些白粉子。劳动一天，粉子、花毛粘满身，简直不象个人样。

工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拚死拚活地干，但得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。一个工人每月要干四百多个小时的活，领到的工钱仅仅能买到两袋橡子面。就是这点工钱，资本家也不让工人全拿到。他们规定：织了三等布罚钱，因事请假罚钱，丢失了劳动工具罚钱……花样多得很，七折八扣，工人真正拿到手的钱就更寥寥无几了。资本家还规定：工人请假满一个星期的开除，有病的开除……各种戒令，就象一条条毒蛇缠在工人身上。这还不算，工人们还要遭受资本家、包工头的任意欺凌、打骂。车间除了日本领班外，还有大把头、二把头、狗腿子，分布在各个车间，监视工人劳动。织布车间的把头王才，整天棍子不离手，象个凶神，对我们徒工又狠又毒。他到车间，故意找岔，看谁不顺眼，不是打就是骂；见了日本领班，却象哈巴狗一样，点头哈腰。我进厂的第一天，王才就宣布

了“三不准”：喝水吃饭不准离开车间，不准随便活动，不准和工人师傅说话。我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，总是不顺王才的眼。有一次，我正学着接线头，王才走过来检查，硬说接得不合规格，嘴里骂着，抬手“啪啪”打了我两个耳光。我眼前冒金花，耳朵嗡嗡响，血顺着鼻子淌了下来。这样的事，在大康纱厂哪天没有哇！我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的折磨，只得从大康纱厂转到了丰田纱厂（现青岛国棉四厂）。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大康是地狱，别的纱厂也不是天堂！在丰田，我又忍受了十几年同样的煎熬！

深 仇

在日本纱厂，男工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已经够残酷的了，而女工遭受的折磨和侮辱比男工还厉害。我姐姐当了隆兴纱厂的徒工后，在细纱车间学挡车、接线头。刚进厂，姐姐人小手生，一看见纱头断得多了，心里就发慌，经常因接不好一个纱头，被封建把头打得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。一次，姐姐跟着一个工人师傅学接纱头，老远望见巡班的把头走过来，吓得她心里蹦蹦直跳，手也哆嗦，一不小心，弄断了几个纱头。把头见了，一把揪住她的头发，不容分说

一顿拳打脚踢，姐姐当场昏倒在地。等姐姐慢慢苏醒过来，狠心的把头又逼着她干活。就这样，姐姐一天到晚站在机器旁边，常常一边干活一边流泪，眼睛都哭肿了，时间一长，眼睛就逐渐模糊、看不清纱头了。父亲见姐姐被折磨成这个样子，心疼地让她在家里歇几天。没想到姐姐歇了不到五天，资本家就贴出布告，说我姐姐无故旷工，把她开除了。姐姐听说被开除，满腔的怒火涌上心头，越想越气，慢慢双目就失明了。

姐姐眼瞎了，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就更重了。全家只能吃点臭粉渣子，这种臭粉渣子，现在连猪都不吃，只能用来做肥料。可是那时候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工人，不用它来糊口又吃啥呢？就是这个，工人们还得每天清晨三点钟去排队挨号，才能买到。为了全家的几张嘴，父亲冒着风雪雨露，整天在外拉车。那年已是深秋，清晨起来，寒气逼人，父亲还光着脊梁，穿着裤衩，赤着脚，拚命地拉车。一天，他拉着满满一车货，沿着一个陡坡艰难地爬着，豺狼般的日本兵开着汽车横撞过来，把父亲撞倒在地。日本兵狞笑着开足马力，扬长而去。父亲血流满地，幸亏几个穷工友用车把父亲送回了家。家里穷得没有半文钱，哪里有钱给父亲治伤？一家人围着父亲哭得死去活

来。父亲躺在炕上起不来，全家生活更陷入了绝境。十二岁的小妹妹看着躺在炕上的父亲，再看看双目失明的姐姐，心想全家可怎么过下去啊！她便跑到母亲跟前说：“娘，我也到工厂做工去。”母亲望着小二嫚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再看看她那骨瘦如柴的身架，真是心如刀割。为了让妹妹能讨口饭吃，母亲只好同意她到大康纱厂去验工。明明知道资本家的工厂大门，是吞噬劳动人民的血盆大口，怎能忍心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再到虎口去受罪呢？看看全家，实在是无可奈何呀！

妹妹入厂后，资本家根本不允许她学技术，每天十四、五个小时在车间里扫垃圾、擦地板、干杂活，经常遭受把头的打骂、折磨。一次，妹妹上厕所，不防被一个姓张的把头发现，便跟了进去，硬说妹妹偷懒，一把将妹妹按倒在地上，用脚踩着她的辫子，抄起旁边的一个纱筒没命地毒打。妹妹昏过去了，把头还不放手。这时候，工人们闻讯赶来，围住把头责问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”狗把头一看事情不妙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工人们把小二嫚送出门口。她爬呀，爬呀，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家，进门一头扎在炕上，就起不来了。妹妹挨了打，还不敢跟母亲说，母亲问急了，只说身体不舒服。我回到家里，扶起妹妹，一摸

头热得烫手，再摸摸身上，血糊糊的，便问：“小二嫚，又挨打了？”妹妹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嘴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滚了下来。

资本家把妹妹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仇恨的怒火涌上心头，新仇旧恨连成一串，再也忍不住了，非要去找狗东西讲理。可那个世道，哪有咱穷人讲理的地方呀！母亲、姐姐怕我闯出祸来，急忙拉住了我。我强压住心头怒火，守在妹妹身旁，妹妹浑身烧得烫人，嘴里不住地说胡话。到了深夜，进工厂才二十八天的妹妹，一个工钱还没拿到手，就被那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。

十二岁的妹妹，自出生以来，只吃了几个月的奶水，是姐姐用稀粥一勺一勺把她喂大的。双目失明的姐姐听说妹妹死了，摸到妹妹的身边，一头扑在她身上，边哭边叫：“妹妹呀！妹妹！”可是妹妹再也听不见姐姐的声音。父亲拖着伤腿喊着：“小二嫚，小二嫚，我苦命的孩子呀！”几次昏倒在地上。邻居们从我家炕上揭下一块破席头，含恨把妹妹卷了起来，抬出屋去。父亲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，拿着从老家逃荒时挑妹妹用的扁担追出屋来，哭喊着：“小二嫚，小二嫚，你上哪儿去呀？你们把我的小二嫚弄到哪里去啊？”母亲晕倒在门口，姐姐张着两手扑在门框

上，拚命地哭喊着：“妹妹，妹妹……”我强忍着眼泪，握紧拳头，心里骂道：“资本家、狗把头，你们等着吧，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账！”没多久，我那双目失明的姐姐也含恨离开了人间。

一仇未报，又添新仇。这笔血债，我牢牢记在心里。

翻 身

长夜催日出，隆冬迎春来。青岛市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解放了青岛。这一天，金色的太阳驱散了笼罩在胶州湾上空的乌云，青岛市显得格外壮丽，海蓝山青，人欢民乐，到处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歌声飞扬。我这个一直被地主资本家踩在脚下的臭苦力、穷工人，第一次挺直腰杆参加了昂首阔步的工人游行队伍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：“热烈庆祝青岛市解放！”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！”

青岛解放了，劳动人民翻身了，我打心眼里感激党和毛主席。没有毛主席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的

一家。当时我在仓库当搬运工人，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，除了每天超额完成装卸任务外，下班后，特别是在刮风下雨和盛大节日的夜晚，我总要到仓库的周围去转一转，看一看，防止阶级敌人破坏。平时，工作再累，我也觉得十分愉快，因为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！不久，我被调到厂保卫科工作。在那里，我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。一九五一年，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。这是一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阶级斗争。我积极投入了这场政治运动，站在斗争的第一线，和广大工人一起，经过内查外调，挖出了潜伏在厂里的国民党特务分子，并协助公安部门清查出改名换姓钻进工人队伍的地主还乡团分子。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。让我两次出席了市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连续三年被评为厂的先进工作者。

一九五二年八月十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面对鲜红的党旗，我心中无比激动，旧社会受欺压的“花毛虫”，今天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，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！我有满肚子话想对党和毛主席讲，可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哪里说起，我举起了右手，握紧拳头，庄严地向党表达了从内心迸发出的誓